

是強有力的民族，誰也別想打敗俄羅斯，外國軍隊一進來就被俄羅斯嚴寒的天氣打敗了。他的這種矛盾心態是當時許多非俄羅斯蘇聯公民共有的。他告訴我：「斯拉夫人中波蘭的文明程度比小俄羅斯人高（小俄羅斯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小俄羅斯人的文明程度又高於大俄羅斯。」一次他讀烏克蘭詩人舍甫琴柯的詩集，他指著書說：「他們在撒謊，舍甫琴柯是烏克蘭獨立派人士，不是甚麼俄羅斯的愛國民族詩人。」在我接觸到的蘇聯人中，瓦夏是極少數擁護赫魯曉夫而仇恨斯大林的人。他說斯大林是個屠殺者，常常嘆息：「斯大林是格魯吉亞皮鞋匠的兒子，俄語都說不好，卻統治了俄羅斯二十幾年，把我們烏克蘭人三分之一給殺掉了。赫魯曉夫是真正愛老百姓的，他要改革斯大林的暴政，要發展改善老百姓生活的輕工業，克里姆林宮的黨中央不喜歡他，把他推翻了。」他也記了一肚皮的政治笑話。

關在監獄裏，時間很多，瓦夏給我講的政治笑話如果都記錄起來，夠編成一本小冊子，而且他還是敢於講笑話罵斯大林的人。以下是我記下來的幾則：

關於斯大林

1944年大反攻時，最高統帥斯大林和參謀長朱可夫在大本營對著地圖指揮戰爭。斯大林問：「我們的軍隊現在應該指向何方？」朱可夫答：「當然是西方。」又說：「我們的軍隊向西方挺進，把歐洲的資本家都扔進大海去。」斯大林不同意，朱可夫生氣，走到走廊上大罵「豬獠」。斯大林聽到了把他叫回辦公室：「你在罵誰？元帥同志！」朱可夫回答：「大元帥同志，我當然在罵希特勒。」

斯大林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坐在一架飛機上，忽然看到一個鬼用鋸子鋸飛機的翅膀，兩人大為吃驚，丘吉爾求鬼說：「快停下

來，我給你別墅、商店，叫你回去當百萬富翁。」鬼不聽，繼續鋸。丘吉爾又急著請求：「快停下來，我讓位給你，叫你當大英帝國的首相。」鬼還是不聽。丘吉爾急著問斯大林怎麼辦？斯大林對鬼說：「鬼同志，你鋸得非常好，我要吸收你當我們集體農莊莊員。」鬼聽了害怕了，馬上扔掉鋸子，逃得無影無蹤。

關於勃列日涅夫

在共產黨代表大會上，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問代表們：「1980年以後我們就沒有肉類供應了，同志們，怎麼辦？」全場默然。忽然一位代表站起來回答：「我們用一天工作10小時來解決，總書記同志！」勃列日涅夫又問：「到1981年後我們就沒有牛奶供應了，同志們，怎麼辦？」又是全場默然。過了一會兒還是那個代表回答：「我們用一天工作12小時來解決，總書記同志！」勃列日涅夫再問：「到了1982年後我們就沒有麵包供應了，同志們，怎麼辦？」還是同一位代表大聲回答：「用一晝夜工作24小時來解決，尊敬的總書記同志！」聽了這位代表的話，勃列日涅夫感動得流出了眼淚，他想了想又說：「同志，謝謝您對黨的支持，我黨找到了解決困難的辦法。但是我們全民一晝夜幹24小時的話，又到哪裏找到那麼多的活幹呢？」「這很好辦，到火葬場去工作，尊敬的總書記同志！」那位代表回答。

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夫人訪問蘇聯，勃列日涅夫在紅場上致歡迎詞：「您好，尊敬的梅厄夫人（其時的以色列總理）！」秘書小聲對他說：「總書記同志，你說錯了，我們歡迎的是英迪拉·甘地夫人而不是梅厄夫人。」勃列日涅夫聽了回答：「是呀，我也知道我們歡迎的是英迪拉·甘地夫人而不是梅厄夫人，可是你們給我打印的歡迎詞稿子上印的是梅厄夫人。」

蘇聯發行了印有勃列日涅夫頭像的郵票之後，郵局職員紛紛向

上司訴苦：信封上的郵票都沒有貼牢。經KGB特工調查，原來寄信者把口水都吐到了郵票正面而不是塗到反面。

關於蘇聯共產主義制度

共產主義像地平線，你越向它走去，它離你越遠。共產主義還有鈔票沒有？教條主義者回答：沒有！修正主義者回答：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回答：有的人有，有的人沒有。

共產黨和資本家有甚麼區別？資本家關心的是金錢，共產黨關心的是人民；資本家把金錢鎖起來，共產黨把人民關起來；資本家認為錢多了地位就高了，共產黨認為有地位就有了錢。

一個蘇聯人和一個美國人一起閒談，美國人吹牛皮：「我有三輛小汽車，開福特上班，開卡吉拉做客，開伏里瓦到歐洲旅行。」蘇聯人聽了笑著說：「那有甚麼了不起，我上班坐有軌電車，下班坐地下火車……」蘇聯人話還沒有完，美國人忙問：「那到歐洲旅行你坐甚麼車呢？」「坐坦克！」蘇聯人回答道。

前面提到的那位大學生也給我講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笑話，記在下面：

政治經濟學教授給大學生講「甚麼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一體化」，講得冗長而含混不清，大學生請他舉例說明，教授同意了。教授說：「保加利亞把陶泥出口給我們，我們製成泥哨後出口到蒙古，蒙古的牧民吹著哨子指揮牧畜。而他們的羊呢？」「出口給我們。」大學生爭著回答。教授說：「不對，出口給東德，東德用羊肉製成美味的罐頭。」「出口給我們。」大學生又搶著回答。教授說：「不對，出口到西方，換成外匯。東德再把羊毛出口到捷克，捷克人把羊毛做成漂亮的服裝，出口……。」「給我們！」大學生答。教授說：「不對，服裝出口到西方，換

成外匯。東德再把羊皮出口到匈牙利，匈牙利製成漂亮的皮革，出口……。」「給蘇聯。」大學生又異口同聲說。「不對，出口到西方，換成外匯。」「那我們蘇聯得到甚麼呢？」大學生奇怪地問。教授回答：「我們得到外匯，美元或馬克，因為我們向東德、捷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出口武器：飛機、大炮、坦克。」

瓦夏對在蘇聯坐牢、蹲集中營都有經驗，他每天把吃剩下的麵包請送牢飯的俄羅斯大嫂切成小塊，用油炒成麵包乾保存起來，又把剩下的煙頭煙絲留下，和發的莫合煙混合保存起來，叫我也和他一樣做。他說：「得準備去西伯利亞，到那邊的集中營要挨餓，也沒有煙抽。」他在這個監獄關了一年多，看守都混熟了，常常在送飯洞口說些悄悄話，知道很多獄外的消息。我坐牢後，每隔半小時便能聽到轟隆隆的機器響，是甚麼？問別人誰也不知道。問瓦夏，他先告訴我：「KGB監獄裏的囚犯都是外國人和蘇聯自己的重刑犯，有等級。監獄有三層，地面一層，地下兩層，我們是關在地面這一層。地下兩層缺少空氣，每半小時要開一次通風機，給死刑犯送空氣，機器響聲是通風機的聲音。」他說關死囚牢房裏的人有一些是中國人，中國人逃來蘇聯後，如果KGB認定其身分是間諜，便一律處死。犯人在受刑前，看守把他們帶到澡堂洗澡，換上乾淨衣服，到理髮室理髮、刮臉，用布蒙上眼睛，會有兩個彪形大漢從暗室裏走出來，用繩子把他們勒死。聽瓦夏講起來，真毛骨悚然。

瓦夏長期經營機械市場，對蘇聯工廠的設備水平相當了解。他說蘇聯民用工廠的設備都很落後，哈薩克斯坦要好一點，西伯利亞勞改營工廠的設備有的還是1917年十月革命時代的。而蘇聯軍火工廠的設備是世界最先進的，軍工廠淘汰的機器比民用工廠的要進步好幾代。幾年前上司命令他到莫斯科接受一批軍工廠淘汰了的車床。他到了莫斯科，部裏命令他去馬雅可夫斯基廣場接收機器，

他聽著奇怪極了，瑪雅可夫斯基廣場哪裏來的車床呢？到約定時間他站到瑪雅可夫斯基銅像下，有兩個人早就等著了，帶他上了小汽車。車子開出莫斯科城區進入大森林，帶他的年青人用黑布蒙上他的雙眼，車子走了好久才停下來，下車了也沒有解掉蒙眼布。兩個人扶著他進入一間房子坐下，才揭去黑布，是來到廠長辦公室了。廠長是個將軍，告訴他三台車床已經裝上了集裝箱卡車，要他親自把車押運到阿拉木圖，對別人決不能說出車床是從甚麼地方來的。說完，在辦公桌上的卡片盒裏拿出一張卡片交給他，叫陪來的人帶他到軍工廠食堂吃飯。瓦夏說他從來沒有吃過那樣高級的飯，桌子上擺的全是商店買不到的食品，真正的黑魚子醬、西方進口的魚罐頭、中國來的火腿罐頭，還有可口可樂和真正的正牌伏特加酒。

阿拉木圖KGB監獄的典獄長是個俄羅斯少校，副典獄長是個哈薩克上尉，每個月都要傳問我一次，問有沒有人欺負我，如果有，他們會懲罰或給我換囚房。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的副檢察長是個大高個、大肚子的俄羅斯人，他也光臨牢房視察了一次，看見我在學俄語，對我說：「我們的外國人勞改營有俄語學習班，如果你到那裏服刑，學俄語的條件也很好。」瓦夏告訴過我，在蘇聯的各種監獄中，KGB監獄是最文明的，不打罵犯人，沒有刑訊逼供，別的執法機構都是一片黑暗，是獄霸的天下，給了錢殺人犯都能買到無罪釋放，沒有錢財給他們進貢，則天天都會挨打受罪、輕罪重罰。為甚麼這樣？因為KGB監獄的犯人都是外國人、犯罪的官員或異議分子，不知道哪一天這些人又會翻身出頭，所以監獄的獄頭獄卒不敢對他們胡來。

牢房走廊盡頭是一間寬大的看守休息室，裏面有電視機，一些受優待的犯人常被叫去看電視，瓦夏是其中之一。那時世界上發生的一些大事，像印巴戰爭、尼克遜訪華、蘇聯軍艦開到孟加拉國吉大港掃雷、智利的馬克思主義者總統阿連德掌政、美國的芝加哥修

建了比紐約帝國大廈還要高的大樓，還有美元貶值等諸般消息，瓦夏看過電視新聞後都會告訴我。他還說我們這層牢房裏住著一個服刑的德國姑娘，叫愛瑪，是個大美人，專洗辦公室和走廊地板，每個看守都勾搭她、調戲她。在牢房裏，我也不時聽到看守們「愛瑪，親愛的」的調笑聲和「不要這樣，不要，不要」的女人哭喊聲。

瓦夏說還有幾個中國人和他一起看過電視。後來我知道被關的中國人中有幾個暗探，而且幾乎是職業的。他們是KGB的狗腿子，偽裝成囚犯和中國人關在一起，偵探同胞的消息。我認識一個住在阿拉木圖叫邵謂敏的蘇州人，當過鞋匠，後來又先後移居卡拉干達、阿斯納拉和塔什干等中國人集中的大中城市。1988年他回蘇州探親，給被他偵探過並出賣過的人發現了，告到安全局，安全局把他關了起來。他的俄羅斯妻子在政府大門前大哭大叫，安全局才放了他。姓邵的就再也不敢回中國了。日子過得非常窮。塔什干的中國老鄉誰都不願幫他的忙。1974年我從柯吉達夫流放地坐火車去阿拉木圖，在車廂裏碰到一個中國人，交談之下，他說：「和你在一個農場住的是不是有個姓麻的中國人？他可不是東西。我剛來蘇聯坐牢時，麻也裝成新越界的中國人和我關在一間牢房裏，晚上他寫我的彙報材料時給我發現了。如果再見到他，我要揍他一頓。」

1972年的1月和2月，一直下著大雪，每天從牢房狹窄的窗戶向外望去，都是大雪紛飛。在雪下得特別大和特別冷的時候，也不放風了，因為沒有給囚犯發棉衣。有時好不容易放風，我在空中接幾片雪花嘗嘗，在新雪覆蓋的地面上踩幾腳，聽鞋底下發出的吱吱聲，享受到了大自然帶來的樂趣。我日夜想念中國，陰霾的天空，冰封的大地，甚麼時候才有春天來臨的一天呢？重重哀思，眼淚早流乾了。小時候讀《紅樓夢》，很奇怪林黛玉為甚麼會有眼淚越來越少的感覺，這時候我知道了，眼淚不僅可以流少，還可以流乾。在這個寒冬，我用血和淚寫了兩部書稿，中篇小說《哀思》和紀實報告

文學《新疆的流民問題》，也許可算我國第一批傷痕文學了。雖然沒有機會出版，我把《哀思》的男主人公向他離去的妻子說的最後幾句話錄在下面：

園子！我不會埋怨你，更不會恨你，雖然我永遠失去了你。在我們這個不幸的國家，一個弱女子，如果沒有勇氣結束自己的生命，會更沒有力量去承擔那些苦難，比死亡還要嚴酷的苦難。

園子，把我們過去的一切都忘掉吧。在今日的中國，遺忘是唯一的靈丹妙藥。你忘掉了，總會有人，不是我們這一代便是下一代，來重提我們曾忍受過的一切的。

園子，我要活下去，你要活下去，媽媽也要活下去，在最大的不幸和苦難中我們都要活下去。英國詩人雪萊寫過：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新疆的流民問題》是我在牢房裏寫的一本小冊子。自從1958年以來，流民，也即官方所稱的「盲流」（指向城市、向邊疆地區盲目流動的中國公民）是中國各大城市最大的人文景觀。此現象肇始於大躍進，興盛於三年大饑荒，到文革時更是逃難者無數，完全無法收拾了。「盲流」全是執政黨的荒政造成的。記得1961年秋我從北大畢業後遠戍新疆，從鄭州轉火車西行，車廂裏擠滿了「盲流」，站的地方都沒有，座位下、行李架上躺的都是人，我到西安才找到個座位坐下來。到了新疆，更是「盲流」的天下。分配我到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離中蘇邊界只有七公里的霍城縣霍城第一中學教書，學校大部分學生都是「盲流」的孩子，也有的是河南、安徽、四川各省孤身漂流幾千里來新疆投親靠友的小「盲流」。

文革時我被押送到伊寧市附近的南柏子煤礦挖煤，到天山下的大東溝修水渠，和我一起幹活的礦工和農民大部分也是「盲流」。他

們中真是三教九流，甚麼人都有，有當過官的，在朝鮮打過仗的，從北平輔仁大學畢業的天主教傳教士，甚至還有參加紅軍長征後流落在甘肅河西走廊的共產黨西路軍戰士。有的人還是滿腹經綸、行俠仗義闖天下的俠男俠女。在他們中我結交了好幾位知心朋友，有的還救過我的命。仗義每多屠狗輩，我對「盲流」有極深沉的感情。1968年冬，我躲藏在新疆大學我的學生處避難，一次在食堂吃飯時看到了副校長張東月，他的胳膊上戴著個白布大袖章，上面用毛筆寫著「大叛徒」幾個字。張東月是老共產黨員，新疆有名的黨內學者，起初就是因研究「盲流」問題而獲罪的。他著文考證1958年後中國的流民規模超過了歷史上最混亂的「五胡亂華」民族大遷徙。見到張東月，我想起了他的研究，也下了決心，只要能活下來，一定寫一本關於「盲流」的書，為我的「盲流」朋友說幾句公道話。

在安靜的牢房裏我奮筆疾書，十幾天便把八萬字的《新疆的流民問題》文稿寫成了。我依據1968年底新疆成立革命委員會時公佈的全新疆人口數測算，進入新疆的「盲流」到那時為止有兩百萬人。兩百萬人，是一支開發新疆的百萬雄師，是一堵保衛疆界的鐵壁銅牆啊！他們為邊疆的開發和安全出力、出汗、出血，但社會遺棄了他們，政府歧視他們，是荒政製造出來的一個新賤民階層。在文稿的扉頁上，我寫下了這樣的題詞：「獻給我在新疆流浪的朋友們，如果他們中有人死去了，就作為對死者最真誠的懷念。」

我出獄時，這兩篇文稿沒有被KGB沒收，我以前寫的《動亂的四年》文稿（逃跑時丟失在集體宿舍，他們從我的住處搜到的）也有了下落。一次，翻譯傳我到預審室，對我說：「現在法庭要開庭審理你的案件了，我們要幫助你，減你的刑。我們把你寫的回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文稿拿走了。你寫一張條子，把稿子自願捐獻給我們，將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利，我們會叫法院從輕發落你。」反正入了KGB之手，文稿是要不回來了，只好寫條子「捐獻」給了KGB。1976

年我在塔拉茲市逛書店，看到了一本小書，俄文書名就叫《動亂的四年》，作者署名是哈薩克人，書前介紹「他」是新疆大學學生，是文革時逃到蘇聯來的，顯然是剽竊了我著作的內容，用化名或他人的名字發表了。出於對KGB和蘇聯的反感，我也沒有去讀它。

2月下旬至3月初，獄警幾次把我帶到另一間辦公室叫我校對口供，厚厚的一大冊，大概不下500頁，裏面也夾著我自己用中文寫的供詞。有一個女翻譯看著，我讀不懂的俄文可以問她。看來她也是新疆來的混血女人，30多歲，漢語和維語都說得流利，人也長得漂亮。同時，也把阿拉木圖市檢察院對我和劉萬瑜非法侵犯蘇聯國界的起訴書的中俄文文本給了我，現在還保存著。我讀起訴書的中文文本，請瓦夏幫忙仔細研究俄文文本，他得出的結論是案情不重，不會讓我繼續坐牢或進勞改營，最多判個監外執行，叫我不必害怕。對牛水的叛徒行徑，他也咬牙切齒，說世界上最卑鄙的人就是出賣同志和朋友的人。1972年3月6日上午，KGB的兩個士官把我押到了阿拉木圖市人民法院受審，下午回到牢房，瓦夏不見了。打開床頭櫃，看到一包點心和一包煙絲，是瓦夏留給我的。瓦夏知道我會比他先出獄，在我學俄文的筆記本上寫下了他在阿拉木圖的外室的地址。他的情婦叫杜霞，請我出獄後去看望她一次。5月份我去看望了杜霞，是個40來歲長得很清秀的俄羅斯女人。她悲傷地說：「瓦夏再也過不上人的生活了。」瓦夏的家在我現在居住的塔拉茲市，20多年來，我一直很希望能在街上見到他，卻失望了。如果他活著的話，已經快90高齡了。世事滄桑，他的祖國烏克蘭獨立了，他母親的祖國波蘭也獨立了，不知他活到這一天沒有？如果他去世了，願他的靈魂在天國裏得到安息。

起訴書不長，所有繁枝末節都刪除了，除了牛水，沒有牽涉任何別人。其中有兩段文字提到牛水，轉錄如下：

1971年4月份，牛水向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團直屬國家安全委員會報告：請你們安排好雷光漢和劉萬瑜的生活，否則出了問題我不負責任。

……

1971年7月20日，牛水向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團直屬國家安全委員會所屬基米爾道烏市安全局報告：雷光漢和劉萬瑜要在1971年7月21日從阿拉木圖市坐火車通過阿什哈巴德偷越蘇伊邊界，出逃伊朗。

我知道此次監獄之災快結束了，下面等著的是勞改營或流放地。雖然瓦夏說我不會被判進勞改營，頂多是個監外執行，我還是不抱幻想。我拿著發還的一套西服、一件乾淨襯衣和一條立中兄送給我的金線織的領帶，說要在上法庭時穿戴，老尉官笑著同意了，說到時候自會給我送來。在這些天，辦理我們案子的檢查官和KGB指定的辯護律師還和我見了面，問了幾個簡單的問題。檢察官的黑色領章上有一道杠和四顆星，不知是甚麼等級。監友華西里·伊萬諾維奇叫我要準備自我辯護，不能靠律師。我日夜用功，用俄文寫了辯護詞，提出了幾點理由，請求法院從輕處罰：第一，我們出逃的全部計劃，準備和行動只在牛水、劉萬瑜和我三人之間進行，沒有任何第四者知道，沒有在蘇聯社會起到過任何不良影響；第二，我們不是間諜，出逃沒有間諜因素；第三，我沒有任何反蘇行動，在請求在蘇聯生活時就表明了自己決不在中國之外任何地方參加任何政治活動的意願，所以出逃沒有反蘇因素。我是個螞蟻般的中國小民，也無力反對蘇聯。和上次俄文翻譯出逃聲明不同，這時我已初步掌握了俄語文法，不用拿單詞硬湊了。沒有字典好多單詞不知道，好在和華西里·伊萬諾維奇關在一起，他是個好俄文老師，認真地給我修改了，既沒有文法錯誤，還文雅而有說服力。之後，我

清早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辯護詞一段段硬背下來，華西里則在一邊作音調上的指正。辯護詞全背下來了，又請看守帶我去理髮室理了髮刮了鬍子。

3月6日上午10點，看守通知我準備出庭受審，先帶我到辦公室，換上西裝、打上領帶，之後押著我坐進了四周都是鐵絲網的小囚車，上法院受審了。車開到一棟不高的樓房前，下車認出了玻璃牌上的俄文字「阿拉木圖市人民法院」，上到二樓，在法庭外面的走廊上看到劉立中，已經在那裏等著了。他用俄語說了一聲「好漢子」，我們都哽咽了。蘇聯一般刑事審判允許家屬旁聽，立中兄要求以家屬的身分出庭，獲法院準許了。走進法院，見到立中兄和幾位俄羅斯婦女坐在一起，後來知道這些旁聽者是法警隨便從大街的行人中叫來的。立中兄以後告訴我，旁聽的婦人問他「審甚麼案子？」他回答：「政治案子。」幾個女人聽了大吃一驚，瞠目結舌。因為在當時的蘇聯，政治案是比殺人案還要可怕的案件。

法警把我帶到被告席上坐下，一會兒劉萬瑜也被帶進來了，看上去情況還不錯，只是消瘦了許多，臉蒼白了許多。他還是穿著囚犯服，萎靡不振，不能和我的神采風發相比，我怨他太土氣、太窩囊了。一會兒開庭了，全體起立，法官和檢察官進了庭。法官是位俄羅斯中年女人，穿著黑色西服套裝，她兩邊坐的陪審員也是女性。檢察官還是找我談過話的那位俄羅斯男人。法官宣佈開庭後，介紹檢查官是阿拉木圖檢查院的三級檢查官，由他宣讀起訴書。起訴書很長，包括我們計劃出逃、被捕的全部過程，和牛水的揭發。說我們偷越蘇伊邊境，破壞了蘇聯邊界的神聖不可侵犯，按照蘇聯刑法，要判處三年有期徒刑，「鑒於雷光漢寫了《動亂的四年》書稿，揭發了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有利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請法官考慮從輕判罪。」接著，法官對我們說有問題就提出來，我站起來背了準備好的俄文辯護詞，從法官和檢察官幾個人

的眼色中我發現，很多部分他們都沒有聽懂，因為我的俄文是洋涇浜。⁷ 劉萬瑜聽了起訴書一下子著急了，因為裏面沒有提到要對他從輕判刑，他站起來捲起衣袖，把身上的傷痕亮給法官看，說是在中國監獄裏受苦刑留下的，要求蘇聯法官可憐他，也從輕判處。我聽了十分不是滋味，紅著臉低下頭來不敢看別人的表情：好漢做事好漢當，中國人留給你的傷，為甚麼要拿來乞求外國人！在長期的流亡生活中，我最痛恨的是中國流亡者中的軟骨頭。

之後，是律師辯護，律師說了不到五分鐘就夾起皮包退庭了。辯護詞說，既然劉萬瑜和雷光漢是一起出逃的，對雷光漢從輕處理，劉萬瑜也應享有同等權利，那位混血翻譯把內容都正確地翻譯出來了。然後休庭，審判官和預審官去了另外的房間商量。十分鐘後，出庭宣判：「由於非法越境，破壞蘇聯邊界罪，判處雷光漢和劉萬瑜有條件的自由兩年。」我聽了「有條件的自由」一詞，感到很新鮮，其實就是監督勞動，也就是相當於中國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所受的對待，但聽起來比「監督勞動」順耳一些。在法庭上沒有當庭宣佈我們服兩年「有條件的自由」刑期的地方。法官隨即宣佈審判結束，我以為就可以出來不回監獄了，不料KGB的獄警又把我帶回原來的囚室裏鎖起來，這個囚室裏只有我一個人了。

一個人坐在牢房裏，想起這一年多的戲劇性經歷，冒死出逃，半年準備換來七個多月的牢獄之災，現在又不知要給流放到甚麼地方去「享受」那「有條件的自由」。思潮起伏，但已經不澎湃。該來的都來了，即將要來的也逃不掉，管他娘的，先安安靜靜睡個大覺吧。整個晚上沒有看守來叫我，第二天早上8點看守也沒有敲門叫我起床，直睡到10點才起床上廁所梳洗，也吃不進飲食。我想，出去以後一定要想法和立中兄先見一面。3月7日上午11點，獄警

7 洋涇浜英語，十九世紀上海、廣東等地中外商人使用的中英文混雜的英語。

打開囚室門，提來了我的皮箱，笑著對我說：「祝賀你，你現在自由了。」把我帶到樓上一間辦公室，有幾位特工官員早等著了，混血翻譯不在，他們也說了些祝賀我重獲自由之類的話。接著劉萬瑜也來了，他的囚服換掉了，一名翻譯把我們兩個人送到阿拉道烏旅社住了下來，交待我們白天可以自由在街上走走，晚上一定要回來睡覺。明天上午一定要等著他們。

翻譯走後，我們立即到立中兄家去了。關了七個多月，走到大街上，覺得天空的太陽和街上的積雪是那樣刺眼，走起路來也是磕磕碰碰，一腳高一腳低。進了立中兄的門，他和徐英斌、馬振興早等著我們了，還準備了豐盛的酒菜。我們和他擁抱著，都流著眼淚。立中兄告訴我，自從我們關到阿拉本圖後，KGB就一次次找他，試圖從他嘴裏收集我們的旁證材料，他一下就覺察出我們陷入到牛水早就安排好的圈套中了，或者是牛水和KGB一起設下的圈套。他說：「我對KGB的特工說了，兩頭湖南騾子給一匹青海馬（牛水的護照上寫的籍貫是青海省）踢到了。」他又交給我一個牛水留下的條子：「劉立中可以告訴你們，我為你們恢復自由出了多麼大的力，等了你們一天一晚，再沒時間等，只好走了。」我們一邊吃飯，一邊說話，一邊流淚。立中兄的感情比我還豐富，哭的次數比我還多，晚上和他分別時，他反覆叮囑我們，去的地方會更艱苦，要小心，既要保持身體健康，也不要再上當受騙。他年輕時在四川生活過，接觸過江湖幫派，他握著我的手說：「江湖風波險惡，你是從知識分子堆裏出來的，沒有接觸過下流的人，你要多小心，保重自己。」